

網路速度與新聞—— 轉變中的記者時間實踐及價值反思^{*}

王淑美^{**}

摘要

許多人批評，網路使得新聞一味求快，傷害了新聞的價值。本文以台灣新聞業為場域，從資深媒體人的實踐探究網路速度介入新聞工作的影響，包含時間秩序、對應策略、及其對於新聞價值的反思。本文主張，網路雖加快新聞生產節奏，但新聞的韻律仍難脫社會運作的大秩序；新聞人自信專業能力足以因應網路速度，但認為網路時代的新聞價值不再是快速蒐集資訊，而是回歸記者的自主實踐，反覆提問並促進社會對話。

關鍵詞：時間、速度、新聞、新聞價值、網際網路、實踐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傳播科技與生活韻律：建立以實踐為核心的媒體實證研究」（102-2410-H-004-236-MY2）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協助研究的新聞與媒體工作者，也感謝評審所惠予之修改意見，使文章更加完善，但文責由作者自負。

^{**} 王淑美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Email: sw@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7/09/05；通過日期：2018/03/06

壹、前言

新聞記者追求即時性，經常被稱為與時間賽跑的行業，這項特質在網際網路、行動通訊、智慧型手機的介入後，更加明顯。近二十年來傳播科技快速進展，在此同時，各方對於台灣新聞界表現則是以負評居多，甚至被稱之為公害。不少論者認為科技使得新聞只顧求快而忽略品質，導致新聞水準的低落。

例如，張文強（2015）便論證：「新形態科技的出現，創造了當下台灣社會喜愛追求速度的文化。而這種對於速度的喜愛，甚至是迷戀，也沒有意外地反映在強調速度的新聞工作中。」又如，唐士哲（2005）批評多元化媒體科技促成虛妄資訊增生，電視新聞追求快速提供資訊，但產出的只是空泛內容；劉蕙苓（2013）點出網路影音成為電視新聞便宜易得的素材，不過產出的也只是瑣碎資訊。有不少人持相近看法，認為網路科技帶來新聞內容的零碎化，也促成了新聞公共性的消失。

科技社會的關係一直是學界熱衷思辨的主題，有些人認為科技帶來社會的加速造成時間的零碎化以及忙碌的焦慮，也有論者認為，應該持平看待科技所帶來的正負影響，一味排斥科技並不切實際。雖然當前批判或評論網路對新聞影響的學術文章不少，但深入探究網路實際上如何影響新聞時間的成果仍然有限，本文欲理解網路科技與新聞產製的關係，特別是記者如何在日常工作流程中運用科技並與之協商。

本文擬以實踐的角度，討論網路科技所帶來的速度提升如何影響了新聞，包括新聞生產的時間秩序，記者的日常實踐，以及對新聞價值的反思。研究設計以深度訪談方法瞭解資深媒體人的日常工作，文章內容首先將回顧傳播科技與時間經驗的關係，檢討傳播科技與速度的相關辯論，接著整理學術界對網路時代新聞的批評，並從歷史脈絡思考新聞價值演變與科技進展的關係，進一步提出以實踐的角度來理解網路時代新聞價值變動：當網路使資訊隨手可得，新聞記者該如何思考自身的價值？

貳、傳播科技與加速現象

從 1980 年代起，電腦超高速進展加以網際網路日漸普及，傳播科技帶來瞬時溝通經驗，在學界也掀起理論上的爭辯。如果像麥克魯

漢所言，電子媒介是跨時代的差異，當代人們更為網際網路的速度而驚異，網路無所不在的環境，也使人產生焦慮，在時間面向特別明顯（McLuhan, 2001）。

Rifkin（1987）指出，電腦科技改變了我們對時間的概念。省時科技應該讓我們從時鐘的支配中解放出來，讓我們有更多的休閒；然而時間好像被切成碎片，永遠不夠用，每塊都填滿了箝制約定和計畫。Negroponte（1995: 195）描寫：「電子郵件是一種衝擊我們工作與思考的生活方式，特別是改變了工作和遊戲的韻律。」因為網際網路伺服器永遠開機，隨時隨地可以近用，更加彈性的同時，也讓人們難以區分上班和下班，最終「人們的工作時間無限延長至每天二十四小時」（Lee & Liebenau, 2000）。當網際網路與行動電話結合，就如 Tomlinson（2007: 102）所言，手機成為新式「終端機」（terminals），工作進一步嵌入人們移動中的片段時空。

Virilio（1995/1997）討論不斷進展的運輸與傳播科技扭轉了時空關係，從真實空間延伸至虛擬空間。科技帶來的速度不僅讓我們可以方便移動，更能密集地看、聽、察覺、想像當前世界，進一步超越空間限制從遠端進行這些活動。身在此處的同時，又出現在遠方現場，像是數位、影像、廣播等無線傳播科技，改變身體的本質——人體成了傳送與接收的終端機。光速改變了感知，身體不再屬於人，而是訊號與訊息的承載具。因此他提出速度政權（dromology）——人並未掌握速度，速度掌控了一切。關注速度與戰爭的 Virilio 由傳播科技與武器的進展來論證，從坦克砲彈、軍機轟炸到核爆，現代戰爭不僅是空間之戰更是時間之戰，而追求速度的終點也是指向毀滅（Virilio, 1986/2006）。

上述討論有幾個共同點：第一是認為傳播科技打亂工作節奏、使時間更加零碎也帶來焦慮，其二是將傳播科技與工作、也就是經濟活動相構連，第三則是對此進展抱持負面悲觀的態度。然而，傳播科技是否帶來行動的零碎化？是否純然是資本主義的工具，加速經濟活動並對勞動者造成壓力？而傳播科技帶來的速度，對社會只有負面後果嗎？

第一種質疑很容易在經驗研究上找到反證。例如 Hubers, Schwanen, & Dijst（2008）運用調查資料分析荷蘭都會區購物者使用資訊傳播科技與行動零碎化的關係，發現家庭背景等非科技因素，才是時間與行動變得零碎的主因。Licoppe（2010）實際觀察高科技公

司內部主管的工作情況，發現即時通訊並未干擾工作，因為工作的常態就是容易中斷。Wajcman（2015）在雪梨的跨國電訊公司的訪談研究也發現，員工每天花最多時間在溝通，資訊傳播科技已經與工作內容相整合。受訪者並未認為科技造成分心，反而視之為可以挪移時程調整工作的利器。換言之，科技並未造成時間與行動的零碎，事實是生活與工作的本質原來就是機動易變。

關於科技與經濟的連結，Rosa（2003）提出批判，認為西方社會為首的加速現象不只有經濟因素，還有文化與結構面向。他將此加速現象的內涵可分成三種，一是科技本身加速，也就是交通與傳播等各種科技的加速，移動和溝通的時間得以縮短。其二是社會變遷加速，如各種美學品味、政治制度、科學知識、結構的更替等，社會內部的加速。最後是各種行動與經驗的速度加快與過程壓縮，生活步調加速以及隨之而來的時間壓力。Rosa 分析，一般常認為是資本主義與科技發展帶來時間經驗的加速，但交通與傳播時間縮短應該節省時間，為何還感覺更匆忙？他認為，是因為第二類加速的程度超過第一類加速，例如，我們期待在更短時間內完成更多事情。Scheuerman（2001）認為，加速現象應與文化、社會等其他面向一起考量。換言之，討論速度帶來的壓力時，不能只是歸因於經濟結構，文化、價值、社會等層面也需討論。

至於被廣為引用的 Virilio（1995/1997；1986/2006）及其對運輸與傳播科技高度悲觀的論點，Connolly（2009）提出批評：Virilio 完全忽略了傳播科技與速度的正面特質，像是知識普及化、民主化、少數族裔的政治平等、新認同與權利的認可等等。他認為，「速度可能是危險的，但不完全是」；與其單向地看待速度提升，應該將之視為「不確定的媒介」（an ambiguous medium），兼有正面與負面的後果。Wajcman（2015）借用 Donna Haraway 的評論，當今議題不再是討論接受或反對傳播科技，而是如何有策略地與之共存，並成為它的頭號批評家。

本文也認為，在媒體與傳播科技浸透社會的當代，抗拒並不切實際，而應以全觀地檢視並反省傳播科技的正負面後果，瞭解伴隨而來的文化、政治等面向之影響，並洞察出與之協商的策略。

參、網路科技與新聞業的速度崇拜

網際網路從 1970 年代發明後，1990 年代進入瀏覽器與全球資訊

網（World Wide Web, WWW）的年代，文字、影音皆以數位形式紀錄呈現並傳送，跨平台匯流的技術更加成熟。到了 1990 年代末，各家媒體已意識到網路的強大潛力，開啟編輯室的改造與網路媒體平台的搭建。雖然新聞媒體向來是科技的積極使用者，但由於數位化科技仍與傳統的編採科技有相當差距，在轉換過程中對新聞人員的工作流程、工作價值與成果呈現都有很大改變。

學界對新聞室數位化提出深刻的批判。Scott（2005）批評，超連結、多媒體技術原本是用來提供更多背景，卻被用來節省成本，製造新聞量的假象。新聞室聚合的結果並非深化，反而是同質化，不同新聞平台都提供相同的內容。匯流時代的新聞產製多靠科技、分享來減低開銷，記者人數變少，卻要負責更大量的工作，將相同的新聞配置到更多平台。網路嚴重影響新聞內容和編輯的選擇，記者用於調查、查證、寫好故事、國際新聞、深度專題的時間變少了，要花許多精力在重新包裝網路新聞。且為了節省成本，調查報導、在外跑新聞的方式是浪費時間和金錢，所以更多記者在網路上找資料。

各地的實證研究都發現類似的現象，顯示科技對新聞業的挑戰是全球性的（如 Avilés & Carvajal, 2008；Avilés, León, Sanders, & Harrison, 2004；Bivens, 2008；Singer, 2006；Thurman & Myllylahti, 2009）。研究指出，科技固然加速記者處理產製新聞的速度，例如剪輯、傳輸都更快，但求快的同時也挑戰了新聞的本質；記者抱怨不再花時間寫作。二十四小時新聞環境帶來了無限的時間壓力，不只是製作新聞的時間越短越好，還有無限的時段內容需要被填補，數位科技讓記者越來越沒有延遲的理由，也因此必須隨時處於待命狀態。網路固然增加了媒體機構與閱聽人的互動，但為了不斷更新，媒體需要高度倚賴外部來源，導致媒體內容同質性高。記者們普遍感受到網路改變了新聞實踐。包括更常在網路上蒐集資訊、發布訊息或新聞，社群媒體、廣告考量與煽情新聞的影響都增加，記者工作益發繁重，但新聞的可信度、新聞標準的品質、以及能夠用來研究故事的時間則是顯著減少（Hanusch, 2015；O'Sullivan & Heinonen, 2008）。

新聞圈並非缺乏自省，也有新聞機構嘗試調整起初的匯流策略，進行反整合。例如 Tameling & Broersma（2013）在荷蘭全國性報紙《人民報》（*De Volkskrant*）新聞室進行三個月的民族誌觀察。早期他們把數位匯流、新聞室整合視為平面新聞的出路，但網路主導的新聞室

能用來向消息來源溝通與查證的時間都變少了。這樣的演變引來記者反彈，《人民報》因此尋求去整合的策略，讓報紙繼續做深度新聞不迫即時，而即時新聞網站就聘了許多在家記者，週間每天要生產兩百則，週末每天一百則。然而上述的調整方式，並不表示報社重新將深度新聞擺回第一要務，放棄網路戰場，而是將新聞人員分流，由電子報追求即時，另保留人力維持深度的新聞報導。

台灣新聞媒體也同樣感受到網路科技所帶來的挑戰。劉蕙苓（2013，2014）以內容分析加上訪談，討論電視新聞引用網路影音的現象，發現電視台將網路視為便宜的影音資料庫，造成娛樂性高、公共性低，且養成記者只重形式的工作常規。不僅電視新聞如此，引用網路消息來源也成了報紙記者工作常態，網友成了公眾意見的代表，而記者習慣從網路獲得資訊，卻缺乏進行查證，其對科技的依賴也導致視野的窄化（楊意菁，2011，2013，2015）。從這些研究可知，各界都憂心看待網路對新聞表現的傷害。

若回溯新聞搶快的負面效應，Bell（1995: 325）在網路新聞尚未普及的年代已觀察到「新聞處理的電腦化持續縮短新聞的截稿時間」——其實沒有證據顯示閱聽眾真的很渴求知道最新發生的消息，但新聞工作者已將搶即時內化為工作價值，而且用以自我衡量。關於新聞業對時間的執著甚至著迷，可以更往前追溯。新聞業被形容為一種「停錶文化」（stop-watch culture）（Schlesinger, 1977），因為現代社會以來，時間已成為另一種商品，追求速度是理性的延伸，而每日新聞循環也對新聞本質設限，新聞的即時性、發展性、次序與歷時長短決定了新聞性的高低，新聞人員總是跟時鐘對抗，以截稿前能完成的新聞則數來衡量其成就。

Schlesinger（1977: 345）認為，時間與新聞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形式，「步調」（pace）是其中的關鍵：「這有種崇拜或迷信的特質。即時性已經被擁抱為一種真正的價值，每日新聞循環的體系有種去歷史的傾向，犧牲了深度與背景，以創造恆久的此刻為前景。新聞與恆久之間有種偏差的對立，我們越重視新聞，越容易忽略新聞背後的複雜因素。」（同上引：349）Schudson（1986: 81）也指出，新聞人員對即時故事優先的興趣是一種新聞自傲，但這種自傲跟新聞的品質與公共利益關係很小，這是「對當下的崇拜主義」（a fetishism of the present）。類似批評可溯及比網際網路或衛星轉播車更早遠的年代。

對當下的崇拜反映在新聞業追求即時新聞、並持續收攏科技以提高報導的速度。那麼，這股崇拜是起於何時？Carey（1986）考據，即時性價值自 1830 年起就透過便士報進入新聞業的價值體系。每份要價僅美金一便士的廉價報在十九世紀成為廣泛銷售的大眾報紙，對新聞史有重要意義。他舉出便士報的重要性：除了有別於過往報紙的菁英取向，便士報取材以讀者喜好為導向，也放棄歐陸報紙黨派立場分明的傳統，改以公眾利益為基礎，使報紙本身成為一受歡迎的消費品，目的是擴大讀者群並攏絡廣告商。再者，儘管商業活動對時間是分秒必爭，以掌握價格變動；對於非商業活動而言，最新的新聞並非總是最好或最有用的新聞，有關政治或都會生活的消息即使晚個幾天得知也沒什麼影響。商業界晨起與睡前都要確認最新價格的反覆習慣，經由大量發行的便士報變成一般讀者的社會活動之一，融入每日的生活韻律。

在此同時，電報科技的進展讓新聞業得以即時運作，「電報給了即時性真實而非虛幻的意義。他讓報紙競爭場域遠離印刷、甚至遠離品質、而直朝即時性而去。時間成了新聞失落的贏家。」（Carey, 1986: 164）不過，Schudson（1978）認為，科技的改變並非自發的，電報技術成熟應用的時程本身就需要解釋。固然電報使大量發行的報紙成為可能，但並未使其變得不可或缺，而便士報的出現跟當時美國的經濟型態，以及教育程度提升，大量歐洲移民聚居都市等社會背景也有顯著關係。Carey（1986）的觀點是，廉價報紙與電報技術將新聞帶離能說明並賦予事件顯著性的意識形態背景，以公眾而非階級興趣作為選材與詮釋新聞的依據，也帶給新聞室所有正在發生的事。然而，要報導的事件太多了，新聞室幾乎無法解釋什麼，高舉客觀與真實作為基本原則，放棄掉原本奉為基本目標的解釋性。於是，美國新聞業的競爭剩下搶即時、搶獨家，而這風氣也擴散到其他區域。時至今日，對速度的崇拜仍主導著新聞業的處理原則。

新聞業搶快當然不是從網路時代才開始。Tuchman（1973）運用參與觀察法探知新聞工作常規，發現新聞室通常依事件分類制訂因應原則，以加快報導流程。例如將新聞分成軟、硬議題，依照時效區分為突發、發展中與持續性，或是依照可預測性區分為排程內與外的事件。新聞機構可藉著這些安排來決定人手調度，並控管新聞處理的時間流。報社內部通常得全天配置留守人力，平日透過電話聯繫採訪、

改寫各地特派員回傳的稿件、或撰寫訃聞，一旦突發新聞發生，這些人員就能立即投入聯繫並進行發稿。到了網路時代，原本為守候重大突發新聞而配置的人力，任務轉變為快速蒐集網路消息並改寫，為網站創造不間斷更新的資訊流並吸引點擊率，至於事件的顯著與否已非主要考量。

從文獻考據可知，現代新聞業的初始與讀者大眾的成形密切相關，受到商業邏輯所引導，而且與資訊傳播科技相結合。換言之，衛星、電腦、網路、手機等科技雖未導致新聞業的速度崇拜；然而，新聞業在科技與商業邏輯的伴隨下追求速度，而此邏輯最終也影響了新聞價值，並改變新聞人員的工作內容。這與本文一開始提出的論述相符——科技的後果經常是正負相伴，而科技影響鑲嵌在社會中，與經濟、文化、價值等因素相互交織，這也是「社會形塑科技」（Lievrouw & Livingstone, 2002）的觀點，我們應更積極理解新聞人員如何與傳播科技互動、協商進而創立規則，演進價值並塑造新聞的面貌。

肆、回歸實踐——網路時代的新聞價值

針對媒體爭相投入網路平台的現象，Witschge（2014）批評，網路美其名增加了閱聽人與媒體之間的互動，其實媒體只在意網路帶來的商業利益，例如從點閱率得知消費者偏好，市場邏輯完全凌駕於專業或公共利益之上。Fürst, Schönhagen, & Bosshart（2015）指出，傳統媒體被認為缺乏互動性，只是單向傳播，而網路與社群媒體平台提供了閱聽眾反饋與主動參與的可能；但從實際情況看來，能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網友占非常少數，多數分享的仍是偏向娛樂資訊或是重新張貼新聞媒體的報導。由於公眾貢獻的內容品質不一，研究更顯示新聞室需要花更多人於品質與正確性的控管（Singer, 2010），而快速的新聞點閱率高也只是迷思（Lim, 2012）。

誠如上小節整理的實證研究發現，網路時代媒體機構更重視閱聽眾的意見，但新聞工作也常演變成追逐即時事件與點擊率，在宣揚草根媒體與人人都是記者的當代，專業記者感到失去自主且充滿不確定性，我們需要對新聞價值提出新的反思。Hansen（2012）認為，在運算術與人工智慧的時代，新聞記者的價值不能只是蒐集與篩選新聞，他提出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置疑（aporisa）概念，作為

新時代新聞價值的參考。*aporia* 在希臘文中是一種質問法，當事人提出問題或反駁，但卻不一定提供某些特定的答案。德希達的後現代理論中，*aporia* 是從文本中發掘出一種無法透過辯證來解決的弔詭或文本自我矛盾之處。*Hansen* 舉例，置疑不是急著透過辯證找出分類或界線，而是從中理解更多比劃定範圍更重要的事（同上引：682）。此概念最重要的是其思考的過程，正如記者報導需與讀者來回協商，因此新聞工作的本質也是在反覆嘗試，找出什麼才是最相關的、讀者最感興趣的，也就是一種持續提問的狀態。運算術只能整理既有的資訊，記者卻能找出被忽略的、未被提及的、但真正需要重視的面向，記者應該是為促進社會對話，挖掘人們感興趣的題材，而非只是擔任守門人篩選既有資訊而已。

從 *Schudson*（1978）的研究可知，近代新聞的價值也隨著時代幾經轉變，例如從歐陸報業的黨派分明，到便士報強調客觀中立，再到二戰後重視詮釋與調查報導等。在當代網路浸透的科技條件下，新聞業也應該有新的價值。新聞媒體不再是為了追求客觀真實，或是僅為提供各方立場角力的平台，亦非僅替閱聽眾蒐集、篩選資訊，*Hansen*（2012）所提出的「置疑」，乃是將新聞工作者的實踐作為價值核心，在反覆嘗試提問中彰顯新聞的本質與價值。呼應此觀點，*Fürst et al.*（2015）提出，大眾傳播未必就是單向傳播，因為之中有新聞記者來回於消息來源及閱聽眾之間，運用其新聞專業促成兩造之互動。由於每個人都有多重社會身分，閱聽眾也可能是消息來源，新聞記者即在其每日實踐中促成動態的傳播協商。

若新聞的價值即在記者例行實踐當中，則研究者更應深入探究實踐的細節。*Dickinson, Matthews, & Saltzis*（2013）呼籲以研究新聞工作者的實踐為核心進行實證研究，來理解轉變中的新聞價值，因為若不能理解記者或編輯實際上怎麼作、以及如何作新聞，將難以掌握新聞產業轉變的意涵。這與 *Couldry*（2004）、*Postill*（2010）的主張相呼應。*Couldry* 認為，媒體研究應以實踐作為核心提問：究竟人們在不同的情境與脈絡下與媒體有關的作為有哪些？為什麼這麼做？又如何做？

Wajcman（2008, 2015）指出，學界對於科技影響速度的理論雖多，但實證研究很少，即使工作中伴隨著與通訊科技的恆常連線已是許多人的生活常態，但相關研究仍然有限，她呼籲更多的實證研究投

人來理解科技與加速現象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Wajcman 的批評也適用於新聞領域。新聞室電腦化雖然是 1970 年代以來的顯著現象，也引來許多學術討論，不過多數都側重科技的衝擊與後果，卻很少檢視新聞人員使用科技的實踐。

實地在三個線上新聞室進行民族誌觀察後，Boczkowski（2004）反駁一般認為科技帶來媒體匯流、改變新聞作業的看法，他提出媒體匯流應該是科技、在地與環境等多因素的複合過程，而且採用科技的路徑可能因組織而異，各不相同。Jones, Munir, Orlikowski, & Runde（2008.12）發現，有關科技如何影響新聞組織實踐的研究非常少，或許同時被組織研究與傳播研究的學者都所忽略了。Jones et al. 利用觀察與訪談法蒐集網路新聞的產製端與消費者經驗，探討新聞室如何因應網路科技變化，包括新聞產製步調更快，新聞更新速度更快、更頻繁，內文使用更多外部連結改變等等。此研究也呼應 Orlikowski & Yates（2002）的觀點，組織內的時程韻律、與工作有關的時間規則，都不是由科技或企業結構單方面所決定，而是由人與科技不停地協商後穩定下來的秩序。對媒體而言，影響新聞生產實踐的因素並不單純由科技造成，商業取向與組織文化尤有重大影響。

在國內學術成果中，潘俊宏（2010）以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探討攝影記者的工作，他認為過去攝影記者的自主性展現於從拍照、沖片、挑片、寫圖說等獨立完成作業的過程，數位相機與網路傳輸成為新聞攝影的主流後，數位科技讓後端的編輯室有更多選擇與處理的裁量權，一方面加深編輯對攝影記者的控制，一方面也因讓隨採隨發成為工作上的常態，驅使攝影記者更投入趕新聞遊戲。郭文平（2013）以文化實踐的觀點討論網路新聞中超連結的使用，雖然超連結原意是豐富讀者的背景知識，但記者因時間緊急，通常只會附上該公司資料庫中舊文的連結，而且因為沒時間一一確認連結內容的正確性，記者偏好放上自己寫過的文章。陳百齡（2016）研究新聞組織的新聞結構策略，觀察報社圖表編輯如何在截稿期限之前「追分趕秒」，處理大量資訊並完成作品。他發現報社會利用資訊時段分流、排定處理順序、利用不忙時段預作準備、熟悉團隊時間配置動態、多人協調並進等策略，俾使有限時間能達成最大效用。

這些文獻雖有寶貴啟發，但欲瞭解網路科技對新聞的日常實踐的影響，仍有許多細節與疑問待發掘，尤其是網路如何鑲嵌於新聞工作

中並影響時間秩序，新聞人如何因應，以及新聞價值可能受到的影響等面向。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問題如下：(1) 網路如何影響記者工作的時間架構？(2) 記者常採取哪些對應實踐？(3) 記者如何思考網路時代的新聞價值？

伍、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長期之連續研究。起始於 2010 年時，台灣新聞業進入網路時代已十餘年，但在科技與商業競爭的壓力下，衍生出置入性行銷、新聞品質低落的質疑，研究者在這階段立意訪問了六位資深新聞工作者，並持續觀察網路科技對新聞的影響，且經由與記者的頻繁接觸與非正式訪談，來掌握新聞業的進展。2015 年前後，研究者注意到多家網路新聞媒體成立，電視圈也謹慎對應網路頻道的挑戰，在此時又訪問了六位新聞媒體人員，並與第一波受訪的資料做對照，以期瞭解科技與媒體環境變化，其中兩位受訪者因陸續轉換工作，於 2017 年再度進行訪談。所有資料都是在本文首次發表。

跨越多年的設計是文化研究領域經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文化的分析往往需要長期的觀察與反思。例如，最早開啟網路研究的經典作品之一，Miller & Slater（2000）的千里達網路研究計畫《網際網路：一個民族誌途徑》，即以民族誌、訪談、長期觀察作為實證資料來源。兩人為了出版該書在千里達訪問了五週，但在之前已有過多次相關的研究計畫，而 Miller & Slater 在當地十一年間進行有關商業活動、親族關係、消費、認同等不同主題的研究，也為理解網路使用提供關鍵的知識基礎。Sheller（2015）以她 1980～1990 年在紐約時報工作期間參與觀察所得資訊，作為個案分析的基礎，探討報紙作為行動媒介的物質性。Spitulnik（2002, 2010）主張以實踐為核心，採取「厚情境、深知識」的寬廣視角進行閱聽人研究，則立基於 1980～1990 年代在尚比亞進行的田野觀察。

以實踐為中心的媒體研究，與英國文化研究、及文化人類學等傳統相呼應，從日常生活理解科技與人互動之間的細微知識，並解構其複雜的結構關係。在此知識論下，本文採取質性方法來探查新聞工作者的實踐並回應研究問題。事實上，研究者於 1999 年至 2004 年間曾任職於台灣新聞業，不僅建立起人際網絡資本，對於新聞工作追求速

度、以及科技如何影響新聞，曾有圈內人的實際經歷，而多年來持續對新聞業的觀察，也為此主題累積有用的前置知識。因此，雖然本研究主要由深度訪談取得實證資料，卻是以文化研究民族誌方法（Gray, 2003）的視角，在長期觀察與鑲嵌性在地知識支持下進行。

從日常實踐切入的研究知識論受到社會學「實踐轉向」的影響，自 1970 年代中期以來，包括 Michael Foucault、Pierre Bourdieu、Anthony Giddens 等學者的理論都以實踐為探討核心，Reckwitz（2002）整理文獻後，將實踐理論視為一種文化理論，他認為「實踐」概念可定義如下：「一種慣例的行為，包含幾個相互關聯的元素，如身體活動、心靈活動、物質和其使用方式，及以領會、技能、情緒狀態、動機等形式出現的背景知識等。」（同上引：249）Shove, Pantzar, & Watson（2012）詮釋 Reckwitz 對實踐的定義，就像「玩滑板」這個實踐包含了滑板（物質）、街道（空間）、玩滑板的認知（心靈活動）與平衡（身體活動）、進階技巧（使用方式）、何時何地可玩等規範（背景知識）。對本研究而言，新聞人員的時間實踐涉及了網路科技、報導場所、對新聞的認知、即時多工的操作、因應工作要求的策略、以及對新聞處理的應然面價值，這些也正是研究問題所欲探究的資訊。

本研究先是以滾雪球方式，由受訪者介紹其他合適的人選。且為了探查不同屬性媒體的工作韻律，刻意邀請了任職於報社、週刊、月刊、電子報、廣播、電視等媒體的專業人士，兩階段一共蒐集十二位受訪者資料，每位在職場上都有十年以上資歷，而且曾任職多家媒體，故能瞭解近十餘年來新聞界的轉變，特別是網路對其工作慣例、策略與價值的影響。由於研究跨多年進行，作者藉由定期與受訪者保持聯繫，瞭解記者工作環境與科技條件的進展。

多數受訪者的工作成果需於網路發表，例如報紙、廣播與電視都有網路版本的內容，因此能探查網路科技如何影響其工作內容。少數受訪者如 A、F、I 的媒體雖出網路版但非經營重心，可作為交互對照。訪談選擇在受訪者日常工作的場合進行，費時二至八個小時不等，所有訪談都由研究者單獨進行，部分人員兩次受訪，瞭解數年之間新聞機構的變化。訪問以半結構方式進行，問題包括工作日的作息，需要用到哪些傳播科技，新聞週期內的重要截稿時間，新聞組織的要求與評量基準，對時間的感受，有什麼對應策略，以及對新聞價值的想法等等。除了以錄音或錄影紀錄，在受訪者許可下，兼以觀察其工作時

的實踐，與消息來源、同業、同事面對面或經由科技中介的互動，其儲存、搜尋、分類資訊的方式。為顧及受訪者隱私，其姓名以代號提及，相關資訊列於表 1。

陸、分析與討論

本文的關注焦點在於網路與新聞加速現象，探討網路科技的速度如何影響新聞產製。為回應研究問題，本小節將從三個面向切入分析，分別是網路如何影響新聞生產的時間結構、新聞工作者因應之策略與技巧，以及新聞人反思網路時代的新聞價值。

一、網路介入下的新聞工作時間

關於社會時間結構，Hawley（1950）討論，人們以事件的歷時（duration）長短與反覆（recurrence）型態來感受時間。反覆的類型有三：韻律（rhythm）是指事件規律地重複進行，節奏（tempo）指

表 1：受訪者背景資料一覽

代號	性別	任職媒體	資歷	訪談時間
A	女	月刊	曾任職日報與月刊，資歷約二十年。	2010
B	女	日報、 網路報	曾任職電視台、日報、網路報等多個媒體單位，兩次受訪，第一次任職日報記者、第二次為網路報主管。	2010 2017
C	女	廣播	在同一媒體任職逾十五年，受訪後不久轉行。	2010
D	男	日報	曾任職網路報、日報，資歷約十年。	2010
E	女	網路報	曾任職日報、後為收費網路媒體主管，資歷逾二十年。	2010
F	女	週刊	曾任日報記者，第一次受訪時任職月刊，後轉至週刊，資歷約十五年。	2010 2017
G	女	網站	入口網站新聞部門，資歷約十年。	2015
H	男	網路報	曾任日報記者，網路報編輯，資歷約十年。	2015
I	男	新聞台	新聞台記者、製作人，資歷約十年。	2015
J	男	廣播	電台總監，資歷約十五年。	2015
K	女	電視	曾任電視記者、新聞部主管，後任網路部門主管，資歷逾二十年。	2015
L	男	電視	前電視台主管。	20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的是每段時間內重複的比率，而掌握好共同進行的時機（timing）乃是協作的關鍵。他也認為傳播科技促成遠距無間斷瞬時溝通，使得社會節奏加速，並緊縮時間關係的網絡；家庭生活的韻律，舉凡起床、三餐、休息與就寢，無一不受到工作機構的影響。

Lauer（1981: 28-35）則提出五個分析時間結構的概念：分別是韻律或週期性（periodicity or rhythm）、節奏、同步或時機（timing or synchronicity）、歷時（duration）與順序（sequence）。韻律是指活動反覆發生的規律性，節奏指事件或活動在一段社會時間內發生的頻率，同步乃是多個社會單位相互協調的時機，歷時是感知事件的時間長短，而順序則是事件先後發生的邏輯。Fine（1990）援引 Lauer 的分析架構分析餐廳工作的時間秩序，廚房的韻律一天之中以用餐時間最忙，廚師的行動節奏勢必加速，時機是相互協調以同時進行的行動，歷時指的是完成烹飪菜餚的時間，順序則涉及上菜與烹煮的適當順序。

新聞的時間特質明顯，但與新聞室時間相關的研究不多。Jones et al.（2008.12）以組織學者的好奇心來探討新聞組織內的時間架構，不過該篇文章注意到網路新聞的產製時間更短、更新加快與頻繁，卻未細緻地呈現網路介入後的新聞業日常實踐如何改變，進而形成新的時間秩序。Lauer（1981）的概念有助於檢視新聞記者的時間秩序，尤其是記者的時間結構如何因網路科技介入而轉變。須注意的是，這些面向在本質是交互影響，難以切割。

多年來台灣的電視台慣例於用餐時段播出新聞節目，此舉架構了各節新聞的截稿時間，以及全天的節目規劃。例如曾任電視台高層主管的受訪者 L 指出，早午晚夜四個新聞帶狀形成節目規劃裡面必須考量的因素，像是「肋骨的感覺」，因為「觀眾建立了一個看新聞的時間他不能動的」。C、J 的廣播電台每天 8、12、16、23 點播出重點新聞。受訪日報記者的工作時間，也依照組織會議時程結構：15:00 ~ 16:00 間回報新聞重點，之後各組舉行編輯會議，17:00 左右確定稿單並分派工作，19:00 早版截稿，21:00 晚版截稿，遇有重大突發新聞在凌晨印報之前都可插入。

不同媒體的截稿時間互異，例如 A 任職的月刊，每月 5 日開始收稿，一邊截稿一邊進行次期規劃，17 ~ 20 日開次期的編輯會議，每月 25 日出刊。F 的週刊是週三出刊，週日 18:30 截稿，週二進行後製，15:00 開小組會議，16:00 開記者會大會，開始籌備下期刊物。受訪者 E

的商情媒體提供企業市場資訊，每天供稿時間為 8:30 ~ 17:30，股市收盤之前都是忙碌時段。雖然工作韻律週期不同，但截稿之前都是新聞工作忙碌的尖峰，而截稿後是可以稍微放鬆的離峰時間。

如文獻回顧時提及，網路介入新聞之後的三大改變：一是即時傳輸，二是無限時段或版面，三是媒體形式匯流。相對於日報，網路媒體隨時可變動、無版面與時段限制的特性，打破傳統媒體線性的結構時間。受訪者 B 第一次受訪時任職日報，他的實踐完全是依照報社的各項截稿時間來安排，例如在 16:00 報稿單之前需完成採訪，因此密集地查資料、打電話聯絡採訪對象，並與社內主管透過即時通訊軟體交換意見，而 17:15 被通知當天新聞被歸在晚截稿的重要版面後，決定先稍作休息吃晚餐。

當第二次受訪時，B 已轉任純網路新聞編輯，工作內容是改寫新聞、上傳稿件、下標，並且上 Facebook 專頁推文。相較於報社的明確截稿與會議時點，網站上班只需要登入通訊群組說「早安我來了」，接下來上稿、聯絡記者、找新聞資訊等等，乃至於同事間的協調會議，都是利用網路進行。小規模的網路新聞興起是近年現象，有別於報社透過固定的會議時間確保組織內成員協作，新聞網站僅要求每天須產生五十則新聞，B 的工作時間也更為彈性，只要與同事約定好有人留守即可。他表示，依慣例從早上 8:30 起每兩小時更換一次頭條，「有時候比較重要的新聞一直進來我們會一直換」。B 的例子也突顯出記者與編輯的工作性質差異，記者的韻律貼緊採訪事件，而編輯的任務則是創造網站不間斷的時間流，以爭取讀者的注意力與點閱率。

因應媒體匯流，記者須供稿給多媒材平台。出門採訪需備齊筆電、相機、錄音筆、上網設備等，報紙記者不只為隔天出刊的報紙寫稿，也要為當天即時更新的報社網站報導，廣播記者不只錄聲音剪輯，也需拍照、寫文上傳至網頁，雖然主要媒體屬性仍有差異，工作內容已漸趨同。在受訪者中，廣播記者 C 認為網路是使報導作品能觸及更多公眾的利器，他不僅要拍照，也需把文稿寫得更仔細。D 的報社明確規定至少每月需產製兩則長度逾一分鐘的影音新聞，每天四則即時新聞。因此他在進入 15:30 ~ 21:00 的寫作高峰期之前，需盡量利用零碎時間發出即時新聞，供網路新聞部門的編審採用並上網。

2015 年受訪時，任職於網站新聞部門的 G 認為，「網路之於電視，就該持續更新」。該網站除了在首頁提供新聞重點，還有新聞專

頁，頭條新聞必須時時更新，讓使用者有同步的感覺：「假設現在有一個地震、有感，然後你看到我們網站上也有地震的東西，你就會覺得，他是跟我在一起的。我覺得那對讀者來講，是一個提醒：在這裡，有任何大事都看得到。」也為了創造這種同步性、共時感，網站頭條每半小時就會更新，而判斷的標準是每分鐘點擊率，若流量低於平均值，就會換新的標題。時時更新，讓網路新聞的節奏更快，但也反映使用者的偏好。

G 指出，雖然網路是跨媒體整合的平台，但網路不是只綜合呈現文字與影音而已。一樣是影音，網路的節奏比電視更快，「網路上的影片，你時間太長，其實 user 沒有興趣。一兩分鐘都太長了！大概幾十秒就可以知道」；「他可能也不太需要主播多說什麼，就是你給他想要的東西」。主播可能是電視新聞不可或缺的詮釋者，甚至是吸引觀眾的要素，但網路使用者只想直接看到想知道的報導內容，「他就挑他要看的，而且可以快轉！」為了滿足快速更新節奏，G 任職的網站必須仰賴大量的合作媒體供稿。

至於負責採訪報導的新聞記者，也因應網路的時間流，必須加速工作節奏。受訪者 H 表示，針對發稿速度或則數，「公司其實沒有硬性規定，只要事情一來就是，大家都希望趕快把手上的事情做完，就是一直發一直發」。因為網路可即時更新，所以不等記者會或事件完結，就期待能有部分即時消息能夠發布，即使是片段資訊也沒關係：「如果他事情非常重要，你想要第一時間讓人家知道，就算只有一個標題也可以。」主跑政治新聞的 H 曾在採訪選舉造勢場合時，看到同業在身旁用手機即時發稿。他認為，網路媒體都是一樣，記者必須把現場正在發生的情況回傳，而非等到事後再報導發生了什麼事。

C 憶及大學畢業剛入行時，同業多數都還是依賴人力在錄音室，幫忙記者打電話進去念稿、錄音、剪接報導帶，該公司引進電腦錄音系統，是由記者打電話進錄音室，語音機器說「請開始錄音」後記者開始念稿，如果有錯，可於系統選擇重錄，例如「刪除請按 1」。但這套系統不久也幾乎停用，改用數位錄音、並在記者的筆電編輯，之後透過網路發稿傳入，與主播在播音室使用的編播系統同步，播音室只需排播放順序，念螢幕上的導言然後按鍵播放即可。操作音檔剪接非常熟練的 C 只需要二十分鐘不到即可完成一則報導並傳送，但一整天處在待命的狀態令他緊張，求快的節奏及焦慮也深植到日常生活中。

歸納網路速度對新聞時間秩序的影響，產製每則新聞的歷時大幅縮短，媒體因此追求與事件同步播報，且網路使媒體形式匯流，也改變了新聞工作的順序，除了敘事的節奏更緊湊，更新的韻律也更快，藉此營造與使用者間共時感。Castells（2010: 491）曾指出，網際網路串起的電子多媒體體系，擴大社會的同時性（simultaneity）與無時間性（timelessness），網路容許全球即時溝通，也打破時間性的階層。網路速度對新聞時間的影響，確實有此特徵。然而，網路並非所有時間秩序的決定因素。

舉例來說，網站後台可透過點閱率知道使用者的韻律，B、G、H 都發現，中午休息時間與晚上下班後網站的流量最高，這表示使用者多半在休息時間上網瀏覽，因此流量尖峰時間仍與傳統的新聞時段重疊。而新聞網站雖然希望發文能有高點閱率，以爭取廣告收入，但「新聞進來的時間不一定」（B）。網路科技雖然可迎合使用者的需求，透過同步性塑造陪伴的感覺，隨時可近用內容，以及恆久時時更新，但新聞的發生是貼緊社會活動，與社會脈動的韻律一致。E 的商情媒體在 2010 年在 17:30 收播，至今仍是如此，因為金融機構下班後不再需要更新。主跑政治線的 H 發現，新聞屬性的韻律很明顯，政治議題會在早上發酵，而消費娛樂話題都在下午才發布：

政治人物，也習慣在上午就出來講，類似那種比較消費、軟性的活動，記者會幾乎都辦在下午，2 點之後。可能是，娛樂新聞我知道是為了隔天見報，或是晚上露出新聞這樣子。對，消費類的跟娛樂都在下午，早上就是都是政治跟財經的東西。（H）

訪問 C 的當天，因為工作不時插入，中午買的便當斷斷續續地吃到下午。在政府記者會採訪時，一拿到新聞稿立刻以手機回報數據，不久後走出會場外與主播連線。他認為，求快已經是記者內化的價值，「你就是一定要趕快去作」、「整個就是急，你就是要很快的把它弄完」。在報導完成前，記者的心情總是非常焦慮，他舉例：「因為你會覺得說，天啊，他不知道開會開到什麼時候，然後會不會十二點就出去了，兩點他回來一下他又出去了，他會不會下午四五點才回我們電話，四五點對廣播記者來講已經一整天的黃金時間都已經

沒了。」即使網路科技讓剪接傳稿都可快速完成，但無法縮短等候消息來源回覆的時間。

整體而言，不同媒體因科技形式互異，產製與更新速度不同，原本有著自己的韻律與節奏，例如月刊、報紙、廣播、電視的新聞作品各有其節奏感，在鮮明的週期結構下運作，新聞人也因應著任務編派、媒體屬性與不同的截稿時間來安排其任務的優先順序。網路介入之後，各媒體尋求跨平台整合，但其結果也讓文字、聲音、影像都變成網路新聞，敘事節奏更快、更新頻率緊密，而且需有無間斷的資訊流。

然而新聞畢竟是伴隨社會活動的專業，即便伺服器可二十四小時不間斷運作，媒體留守人力最多只會到凌晨一點，這是與閱聽人的作息同步。政治財經新聞發生與政府、議會活動，金融市場的交易有關，消費娛樂新聞也跟緊貼產業慣習。除了突發新聞之外，財經新聞的忙季跟企業的報稅、財務報表發布、法人說明會、股東大會等等制度上的週期交疊。因此，網路科技的速度雖然會影響新聞發布、更新與敘事節奏，但新聞仍是與社會整體行動秩序一起運作。

二、新聞人對應網路的實踐

上小節提到網路平台在許多面向改變新聞產製的時間秩序，但即使不須發布網路即時新聞的 A 與 F，工作中也需倚賴網路。例如 A 透過雲端硬碟收稿，舉凡與攝影、外稿作者的聯繫，都靠網路完成。2017 年受訪時，F 強調，「每天晚上最重要的就是充電」，他固定把手機與平板充飽電，除了上網搜尋寫作參考資料，追蹤其他媒體，社群媒體的蛛絲馬跡也可能成為報導題材。相隔七年受訪，不變的習慣是利用瀏覽器最愛捷徑來區分執行專題，每期作品完成前都參考上百個網頁資訊。智慧型手機與名片管理系統也是其採訪工具，2010 年第一次受訪時通訊錄達四千筆，2017 年資料已達上萬筆。換言之，網路成為工作的環境與條件，是新聞產製的必要工具，且滲透程度持續更廣且深入。

Silverstone (2005) 主張，研究者應認真看待日常生活，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瑣事所具有的獨特性與一般性，能讓我們更瞭解資訊與科技在社會中的私人與公共影響。網路速度除了帶來時間秩序的改變，也影響了時間與空間的相對關係，本小節呈現新聞人日常實踐

的細節，藉此瞭解網路科技如何鑲嵌於新聞慣例之中，以及新聞人面對速度壓力所對應的策略。

（一）即時多工

受訪者 E 任職的財經媒體在網路報創設潮之前就成立，為提供金融機構即時財經新聞。在新聞界服務逾二十年的 E，平常在政府財經單位記者室發稿，固定的座位上有個人的物品，像是筆電、外接螢幕、外接鍵盤滑鼠、無線電話、茶杯、泡麵碗、玩偶、記者會紀念品、工作表、通訊錄、電子計算機等等。工作時間為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作息時間固定是他喜歡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進行訪談這天，我們約在記者室碰面，當他忙於發稿時，我觀察他工作的流程：

他把剛才看的太陽能個股報告貼了一段英文在發稿系統，一邊查字典，一邊改寫成簡短的新聞稿。寫稿過程一邊查其他相關新聞如奇摩股市即時新聞，有時拿出計算機來計算數據。此時並拿出通訊錄，依產業別有金融、傳產與電子三大本，裡面有許多手抄的電話與人名。先打手機給正在寫的個股分析師，打了好幾個都沒人接，又打給券商分析師。看了外資報告後，跟券商討論報告的看法，並問第三季新產能的預期，他一邊做筆記，認為報告的數字有問題，繼續打字並一邊對照名詞解釋。這時他的同事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傳來業界動態，說某刊的某記者離職轉去某報，E 跟他聊一兩句後馬上回到寫稿。她查 operating margin 的中文是營業獲利率。寫稿的過程同時開了八個瀏覽器視窗、與同事的對話視窗、股市資訊系統、以及一份外資報告。

訪談 E 的這天下午他參加了金控公司的記者會。現場文字記者因為多需製作影音，一邊聽記者會、一邊拍照，也有人持小型的攝影機錄影。攝影記者身上揸了各式長短鏡頭照相機、數位錄影機以及腳架，在會中不停轉換。E 拿到資料後，試圖在十五分鐘內發出一則稿子，因為要寫稿，他無法在會後立即靠近總經理等人士提問，只好請同業轉述剛才的問答內容。記者會結束後，記者們移至集團準備的記

者室繼續寫稿，E 細讀資料後對其中數據感到疑惑，試著致電給財務長，但已無法聯絡上。

記者多工支援多平台是媒體節省人力成本的策略，但此舉一方面使得報社、廣播與網路媒體記者的實踐同質化，另一方面促使分身乏術的記者向同業求援，例如 E 為了發即時新聞而無法把握時機向財務長提問，只能依賴同業轉述，因此所發的新聞難與其他媒體有所差異。原本彼此競爭的記者轉而相互支援，以因應眾多繁瑣的工作要求，記者不再珍視獨家，轉而追求不被獨漏。

（二）時間挪移

如同文獻回顧部分提及，網路化浪潮下，媒體採取網路多角化經營策略後，增加許多工作內容，也讓記者工作變得更加繁瑣。訪問 D 的這天，他去參加一場電影宣傳兼信用卡產品發表會，在場多是娛樂線記者。他用數位相機拍了現場影音，也找機會跟發卡銀行副總經理敘舊攀談，尋找記者會之外的題材，並瞭解金融業動態，之後還搭副總便車回到記者室，因為他當天需要代班同事處理該部會的新聞。D 的媒體要求記者每月產製兩則影音新聞，並需發六十六則即時新聞，否則考績不佳。

D 指出，雖然即時新聞不難，但是「他一樣占去你的工作時間」。D 的策略是，先調整心態去滿足最低規定，設定優先順序，即時新聞不要花太多力氣，主要精力放在日報新聞，而影音則是當天拍完後再處理成較無時效性的故事。因為即時新聞只要「有就好」，而影音新聞也是設備訓練均簡陋比不上電視台，每則卻得花上一個小時去作，就等時間更有彈性時再處理：

通常你自己掌握到的獨家消息你就不會發即時，因為你一發即時所有人都看到。……即時新聞……每天都還是會收到一些企業寄來的新聞稿，我們就把這些新聞稿直接就是複製一兩段就貼上去。……所以時間上就是大概慢的話就是十幾二十分鐘吧，快的話就五分鐘就把他搞定。……你自己要大概稍微修一下，就是挑最重要的就好，因為這種即時新聞不要超過一百字，他不要很長，他只要一百。……影音的話就

是，新聞發完之後、或者就是說，新聞的隔天，雖然那個時效性會有落差，把它處理成沒有那麼即時性，把它做得比較趣味性多一點。

除了依新聞重要性調配工作先後順序，以及所投注的時間精力，記者也善用網路特質來因應無時無刻不間斷的發稿需求，例如 H 提到，記者總需要一些串門子、閒聊的時間，才能與消息來源混熟並探知情報，但網路報又要求定時更新，於是他利用網路預約功能來發稿。

我們系統可以做預約的動作，其實這也可以解決掉一些。比如說我可能知道我下午有事情，那我又不想我那段時間讓公司的人覺得我很像沒有在寫稿這樣子。那你通常沒事的話可能就是在跟委員串門子、聊一些東西這樣子，可是公司內部的人不見得知道，因為他們也許可能沒有跑過新聞，他們不懂得，為什麼你這段時間都一篇稿都沒有。所以就是會用預約來解決這個東西。

遇到重大突發新聞的時候，網路瀏覽量暴增，期待能持續更新，「像之前爆鄭捷殺人，大家不停在看，你的東西有沒有在動」（H）。但新聞日常也有無趣平淡的時候，為了提供不斷更新的流量，內容需持續更新，因此電腦發稿系統的預約功能，創造了時間挪移的效果，讓記者不需守在電腦前也能發稿。G 也表示，夜間新聞更新多半是編入排程定時發稿，雖無人留守，仍維持網站二十四小時運作的感覺，因為網路如果沒有持續更新，使用者就會失去興趣。

（三）空間轉化

改變時空秩序是傳播科技的核心特質，除了能當時光機預排發稿，網路也能改變空間的意義。從 B 的實踐，可發現私人空間如何轉換成工作場所，並被賦予多重意義。B 曾擔任電視台、網路報、日報記者，2010 年受訪時他已任記者十年，到綜合性日報約六年，已婚且育有年幼子女。這階段的每日作息是在接近中午前送週歲兒子去保母家，三歲女兒到娘家，傍晚是日報記者最忙的時候，由媽媽去保

母處接回兒子，到了發完稿一起回家時常已經十一點。為了能在外隨時隨地確認訊息、傳稿單、接收電子郵件，iphone 上市後不久他就成為使用者。約訪這天他與同業餐敘後搭計程車回娘家，途中不停地確認手機訊息。我們抵達時約下午兩點半，三歲的女兒正被外婆揹在肩上，B 簡短地介紹我之後，又問起先生是否有順便把筆電拿來。當他忙碌時，我以觀察補充訪談的不足：

為了趕著送出稿單，他立刻坐在平日工作的桌前。打開電腦連上無線網路，一開機即登入即時通訊軟體，與報社長官確認攝影單，以及當天發生的新聞該如何處理，連弟弟回來都未交談。……他一邊打稿單一邊安撫小孩，同時開視窗查資料，與同業及先生交換即時訊息，打電話給採訪對象訪談，一手抄筆記、一旁還有計算機用來確認漲跌幅、成長率等資訊。下午四點半他趕在小組編前會之前送出稿單，這時小孩來身邊說他要睡午覺了。他結束電訪就開始整理書桌旁的床鋪，他說女兒只要在媽媽身邊就可以乖乖睡去，否則怎樣也不睡。

透過網路、手機等傳播科技，B 將娘家轉化為新聞室與育兒室，挪轉空間的意義，在完成工作同時也能照顧小孩，以實踐他作為媽媽與記者多重身分的責任。不過，也因為十年資歷讓她建立完整的人脈與消息網絡，以及非突發新聞的特性，才能順利在家完成採訪。當時他盡量不讓外人知道在家發稿，以免被認為「不認真」，顯示「在場」仍是新聞記者被衡量的標準。

2017 年再度受訪，看到當年的紀錄時 B 說：「那是最辛苦的階段」。這時他已轉職到網路報擔任主管與編輯，除了孩子已經長大，他的工作內容也有所轉變，由外勤改為內勤。他以家為基地，與另兩位同事維持一整天新聞網站的收稿、聯繫、調度與發稿，互相協調用餐與接送小孩的時間。此時他不需再諱言在家上班，因為所有同仁也都是在各自的地點處理新聞，上班就到即時通訊軟體的群組發言，「大概一個月才進一次辦公室，因為一直進去沒事啊，我在家裡也可以照樣做」。由於網路應用的深化，以及新興組織的規模縮小，遠端工作在新聞產製上更加普遍，但人手短缺的同時，記者是否須親到現場採訪的標準也出現鬆動。

三、網路時代的新聞價值反思

本研究從網路速度對新聞記者的時間實踐切入，也察覺出新聞價值的轉變。正如 Rosa（2003）所分析，科技固然帶來加速，人們常因此期待在更短時間完成更多任務，因而感到時間壓力。網路速度帶來的影響，超越了原先的期待，就新聞而言，組織、慣例、市場乃至於文化價值，都起了變化。

網路帶來媒體匯流，報紙廣播等媒體藉由網路提高時效性與可近用性，加入與電視競爭的新聞戰場，不同媒體記者的實踐變得同質化，都須進行影音、文字的報導；另一方面，原本分屬不同市場的新聞工作者都加入同質的新聞競爭。為應付更多平台與任務，以及更激烈的競爭，記者的時間變得更加瑣碎。網路點閱率使近用新聞的實踐即時顯形，新聞媒體可更快速且量化地掌握閱聽眾喜好，當社群媒體成為網路使用者閱讀新聞的入口後，閱聽眾的屬性與偏好更能被具體掌握。

網路能提升報導速度與行銷效率，對新聞專業的影響卻是好壞參半。網站主管 G 認為網路特別是經由社群媒體的點閱可幫助媒體更瞭解使用者，週刊記者 F 透過網路蒐集資料、從社群媒體獲取報導情報，任職廣播媒體的 C 與 J 認為媒體匯流給了廣播新的發展契機。必須發即時新聞的報社記者 D 則深感到網路讓記者變成「辛（苦）創（傷）行業」；網路報記者 H 認為點閱率被誤作為文章受歡迎或影響力的指標，卻容易忽略新聞屬性的本質問題，例如政治財經新聞在點閱率上總是較不討喜。

在 2015 年受訪時，電視新聞工作者認為網路對其衝擊不大。曾任電視新聞製作人多年的 K 表示，「因為就是有一群人他並不看網路、他並不上網」，「他每天看電視時間來講，他可能在那邊播半個小時而已，我覺得電視並沒有大家所想像的那麼沒有希望。」相較於報紙與廣播視網路為轉型契機，J 表示新聞部並不在意網友意見、只在意收視率，L 則認為網路對電視的威脅還是「未來式」。這可能因為電視早在網路之前就透過衛星與每分鐘收視調查來追求即時，網路速度只是使此趨勢更加明顯。

就記者時間實踐而言，網路速度確實造成了某些改變，但並非所有改變。2010 年受訪時，E 認為影音直播可避免記者對消息來源斷

章取義，讓投資人知道「到底他真的是怎麼講的」，直接判斷是否下單。近兩年直播成了記者會現場常用的工具，不過直播只能播出消息來源主動揭露的內容，有關藏在財報裡的資訊或者與近期新聞事件的連結，仍須靠記者基於其專業，旁敲側擊地探問才能獲得。雖然消息來源不再需要透過媒體機構中介意見，大眾也可直接觀視，兩造之間仍有著權力與資訊的不對稱，網路直播僅促成表面的互動性，並非真正的交互協商，仍須仰賴記者基於專業的反覆提問。

本研究的受訪者對於台灣當前新聞環境的批評，大多並非針對網路科技帶來的加速，因為求快幾乎是所有新聞工作者的共識；最多的不滿是來自於組織或主管的新聞判斷及管理方式。H 過去任職週刊、受訪時在網路報擔任主管，他認為記者更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帶記者的時候也教他們，你不要覺得每天發完就沒事，其實記者真的要做功課」；因此即使在網路報，他還是會爭取一些時間，「寫一些比較綜合性的分析之類，或是觀察之類的」。

廣播記者 C 的意見與 H 相似，他認為所有廣播剪輯的技巧，上線後不久就能學會，更重要的是「你要怎麼去找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你怎麼想到你做的新聞是別人想聽的」，所以「沒事的時候你要去想一些題目」。他對工作最不满意之處，在於主管指派的任務經常是暴露對新聞進度的無知，卻使記者時間被切割，自主性也被剝奪：

以前曾經溝通過，但是後來我會覺得你花費力氣跟他溝通然後你又氣，然後你不如花二十分鐘弄一弄就給他了，他也滿足他也開心……只是有時候真的很鳥，鳥到你跟受訪者訪問的時候你自己都覺得很好笑，然後有時候編播會說你幹嘛發這個稿子啊真好笑，編播不見得會進去看那個系統，他不知道是因為長官要你做的。（C）

雖然於不同時間點受訪，受訪者們共同認為，新聞記者工作最吸引人之處，在於自由與自主。D 曾在擔任記者約三年後轉行為企業公關，但不久又重返舊職，因為媒體的工作「比較彈性，我可以比較多自己，時間是你的，你自己可以作比較多的自主」。曾轉任多個媒體的 E 資歷逾二十年，他領導的小組共八人，有些成員已擁有股市研究員的專業資格，但選擇當記者，因為他們不願被「綁得太死」。他認

為新聞人的特質是有很多想法、自由度很高，以上對下的強制指定工作內容反而限制新聞表現：

你要用一個「管」的這個東西來去架在這上面的話，其實對下面來說是一個思想上的箝制啦，因為他覺得說，長官都會叫我去做什麼……其實你完全限制了他那個主動性，我覺得一個新聞記者如果他沒有主動性的話，完全都是長官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話，其實那個新聞是死的，就是你沒有辦法去讓這個記者去發揮說，OK 我這個專業裡面我發現到什麼。所以我覺得說，我會比較希望，這個 team 裡面大家是有主動性的……對，我覺得這樣對一個新聞人來說，他才能夠真正的發揮。（E）

或許 E 任職於會員訂閱的小眾專業媒體，才能免受商業媒體之間激烈新聞競爭壓力，向點閱率與廣告收入屈服，而抱持著尊重記者自主的價值。然而，與 E 類似作法的新聞主管並不多見，在本研究進行時，深刻感受到新聞業的危機。C 在受訪後一年決定轉行，B 的公司盛傳新資本引進後，將不再重視深度報導，他與同事已決定集體請辭。其實讓新聞人倍感威脅的並非網路帶來的速度，而是被迫花費精力與時間去追求不具新聞價值的資訊，只為填補時段或營造不斷更新的流量。

網路速度對新聞的價值原本是帶來即時性，但商業邏輯迫使實踐背離新聞人的主動性。其實，網路時代蒐集資訊更加容易，熟悉相關的技術操作也不難，快速的資訊容易取得，但記者基於其專業背景與判斷力，挖掘出消息來源不願揭露、而有益於公共利益的報導，則是其獨特價值。記者們也期待更多思考的自由與自主，構思閱聽眾感興趣又有意義的題材，在每天工作慣例中反覆實踐其求真的價值。

柒、結論

本文關懷科技如何影響新聞產製，尤其網路速度對新聞實踐的影響，先回顧有關科技與社會加速現象的討論，理解傳播科技改變時間與空間經驗，焦慮與忙碌感受隨之而生，不少學者採取負面的態度，

並認為科技只服務了資本主義且使時間更加零碎。本文則認為需一併思考科技帶來的正負影響，並將社會與文化等面向都納入觀察，思考人與科技互動的策略。

針對網路科技如何影響新聞表現，學界研究多採負面觀點，在不同國家的實證研究都凸顯了新聞媒體因應網路採取的跨平台經營與即時更新策略，讓新聞人員疲於適應不同媒材，填補無止境的資訊流，卻無時間好好思考與查證，導致新聞同質性高且品質低落，這些描述也出現在台灣新聞界。不過若探究新聞界求快的根源，可發現早在網路之前，已多有批評。新聞界追逐最後更新、對當下的崇拜，可能早在第一份大眾報紙便士報發行時就已出現。亦即，追求速度的新聞文化是在資本主義與科技的可供性交互運作下，成為與新聞產業共生的特質。如果新聞產業自始即追求科技與速度，則退用科技的呼籲並不切實際，而應該瞭解新聞人員如何在工作之中與科技互動，以及科技如何融入新聞產製的慣例之中。

基於此立場，本研究探討網路如何影響新聞產製的時間秩序，新聞人因應策略，及其所認可的新聞價值。運用 Lauer（1981）分析時間結構的概念—韻律、節奏、同步、歷時與順序來檢視新聞工作可發現，新聞組織的韻律原本是涇渭分明，例如電視與廣播新聞有早中午夜四個帶狀結構，報社則設定眾多截止日期來使資訊分流，這些期限涉及新聞工作的週期，也是記者策略性地安排其工作順序的依據。網路介入除了使記者必須因應跨平台的內容需求，一方面加快新聞內容的節奏，數位化科技縮短每則新聞製作的歷時，也使新聞得以更快更新，時間結構更加彈性，新聞不再滿足於「發生了什麼事」，而意在傳達「正在發生」的情況，與進行中的事件更趨近同步。

然而，雖然製作與傳輸新聞的時間縮短，但是等待或進行採訪所需的時間，仍是由事件本質、消息來源的可得性來決定，而構思題材、查證比對，就需要歷經更長時間。網路點閱率雖使媒體更能洞察使用者近用新聞的韻律，但快的新聞未必是好或重要的新聞，即使新聞網站可以永不關機，新聞事件仍需隨著社會的大秩序同步運作。換言之，科技無法單獨決定新聞的時間秩序。

網路已成為新聞工作的科技條件，本研究探查商業媒體新聞記者的時間實踐。記者蒐集資訊，與消息來源查證、討論、確認，寫稿整理，與同業交換消息，發布即時通知給同事，多重工作在極短的時間

內交替進行；但多工實踐也有分身乏術的困窘，例如忙於即時稿而難以抓住現場採訪機會。為了因應快速供稿以及瑣碎多樣的工作內容，記者傾向與同業合作，這也使得媒體資訊更加同質。

商業競爭考量下，記者被賦予越來越多的工作責任後，發展出相對應的策略。例如平面與廣播媒體都想利用網路的匯流特性爭取更多閱聽眾，但時間有限之下必須有所取捨，於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最重要的內容，次要的任務就以零碎時間應付之。也有人利用網路系統的預約功能，透過預排更新的時間挪移，爭取更多彈性時間。這反映網路速度提升同時，媒體組織與閱聽眾對速度的要求也跟著提高，即使無重大事件仍期待持續且密集的更新。部分記者善用傳播科技改造空間的使用意義，在多重社會身分之中切換，使自家書房成為育嬰房兼新聞室，但採訪須親到現場的價值也被磨蝕。

本研究發現，資深新聞人多半自信能駕馭網路速度，也認為在事件發生時能儘快處理，是新聞工作的本質，但問題在於商業媒體組織或主管的新聞判斷及管理方式。2015年《端傳媒》刊出〈「即時新聞」成癮〉系列報導（呂苡蓉，2015），對於新聞組織過度強調即時，導致新聞內容品質低落、正確性堪慮的現象，記者們道出批判與失望，與本研究受訪者抱持相似觀點。當第一線新聞工作者已普遍不滿，難道新聞主管看不見問題？

可能的解釋是，新聞困境並非肇因於少數主管，而是更全面的現象。Picard（2014）探討當前新聞產製模式已有根本改變：一是服務模式（service production mode），另一是精工模式（craft production mode）。大型商業新聞機構屬於前者，致力使新聞快速散布於多螢平台，更甚於採訪製作新聞，因此大量倚賴通訊社、其他機構與閱聽公眾提供的內容，新的模式改變了員工的實際工作與所需技能，這對資深新聞工作者的影響重大，因為這與原本他們所受的訓練與信仰的價值相抵觸。新聞工作者紛紛離開大型機構，興起創業潮，以專題方式經營議題並深度報導，透過網站直接與讀者互動，也就是精工模式。不過因為人力與資源的短缺，小眾新聞網站無法做到傳統商業新聞機構的廣泛布點，報導內容多元性勢必受侷限。

台灣新聞界的發展與 Picard（2014）之觀察有許多共同點，本研究的成果顯示，記者與編輯日常工作早已融入網路收集資訊、處理資料、聯絡消息來源、傳遞稿件，網路速度提升本身與新聞專業並不衝

突，衝突的是組織對新聞本質的忽視。如同前文提及，科技應被視為不確定的媒介，兼有正面與負面的後果（Connolly, 2009），而其後果常是文化、經濟、社會等因素與科技的交互協商所產生（Scheuerman, 2001）。本研究發現，經濟與文化因素對新聞的影響可能更甚於網路科技本身，商業新聞媒體想藉著網路科技觸及更多閱聽眾，過度專注於傳布速度與通道，卻忽略了內容產製，終使新聞價值產生改變。

過往新聞機構的重要價值可能在於其守門人角色，為閱聽眾收集消息並快速回報。在網路時代，人人都可搜尋近用並散播大量資訊，新聞媒體仍執著於傳布速度，其專業價值也被磨蝕。事實上，新聞價值不應寄託於網路科技，運算術只能以過往紀錄為基礎，難以在曖昧不清的社會關係中開創題材，直播只能排除傳輸的時空限制，無法改善消息來源與閱聽大眾的權力距離。

本研究受訪者反思，網路時代應有的新聞價值，應是發揮新聞專業的獨特之處，亦即，讓記者回歸其專業的實踐——不受限地發揮想法，自主尋找不被主動揭露、甚至被忽略的題材，進而增進民主社會的公共溝通。民主社會仍需要大型商業媒體機構提供全面性且大量的新聞，但商業媒體應找回新聞的核心的價值，唯有讓網路回歸其工具性角色，以內容為經營重心，方能使新聞業重返黎明。

本文基於長期觀察與深度訪談的資料，回應了研究問題，但基於人力與資源限制，未能訪問到媒體企業家的想法，後續除可嘗試瞭解媒體經營者，也可從消費運動的角度來探討。閱聽大眾身為新聞的消費者，如何看待網路時代的新聞，若能透過購買的選擇來使媒體經營者正視其需求、提高優質內容，進而改變台灣新聞業生態，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參考書目

- 呂苡榕 (2015.10.15)。〈「即時新聞」成癮 台灣媒體慢性自殺 (上)〉。上網日期：2018 年 2 月 5 日，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5-taiwan-InstantNews01/>
- 唐士哲 (2005)。〈在速度的廢墟中挺進：電子媒介新聞的唯物批判觀點〉，《新聞學研究》，84：79-118。
- 張文強 (2015)。《新聞工作的實用邏輯：兩種模型的實務考》。台北市：五南。
- 郭文平 (2013)。〈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場域中的使用：一個文化實踐觀點的研究〉，《新聞學研究》，117：135-178。
- 陳百齡 (2016)。〈追分趕秒：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策略——以報社圖表產製為例〉，《新聞學研究》，127：75-117。
- 楊意菁 (2011)。〈從「網友說」新聞探討公眾角色在新聞報導的變化〉，《傳播研究與實踐》，1(1): 43-53。
- 楊意菁 (2013)。〈網路意見的新聞再現與公眾想像：「網友說」新聞的內容與論述分析〉，《中華傳播學刊》，24：119-164。
- 楊意菁 (2015)。〈新科技脈絡下的新聞與公眾意見：新聞記者的認知觀點〉，《資訊社會研究》，28：105-142。
- 劉蕙苓 (2013)。〈為公共？為方便？電視新聞使用網路影音之研究〉，《中華傳播學刊》，24：165-206。
- 劉蕙苓 (2014)。〈匯流下的變貌：網路素材使用對電視新聞常規的影響〉，《新聞學研究》，121：41-87。
- 潘俊宏 (2010)。〈趕新聞遊戲下的「真實」：攝影記者的勞動處境與專業焦慮〉，《新聞學研究》，105：247-275。
- Avilés, J. A. G., & Carvajal, M. (2008). Integrated and cross-media newsroom convergence.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14, 221-239.
- Avilés, J. A. G., León, B., Sanders, K., & Harrison, J. (2004). Journalists at digital television newsrooms in Britain and Spain: Workflow and multi-skilling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Journalism Studies*, 5, 87-100.
- Bell, A. (1995). News time. *Time & Society*, 4, 305-328.

- Bivens, R. K. (2008). The Internet, mobile phones and blogging: How new media are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2, 113-129.
- Boczkowski, P. J. (2004). The processes of adopting multimedia and interactivity in three online newsroom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 197-213.
- Carey, J. W. (1986). Why and how? The dark continent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R. K. Moanoff & M. Schudson (Eds.), *Reading the news* (pp. 146-196). New York: Pantheon.
- Castells, M. (201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Connolly, W. E. (2009). Speed, concentric cultures, and cosmopolitanism. In H. Rosa & W. E. Scheuerman (Eds.), *High-speed society: Social acceleration, power, and modernity*.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ouldry, N. (2004).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 14, 115-132.
- Dickinson, R., Matthews, J., & Saltzis, K. (2013). Studying journalists in changing times: Understanding news work as socially situate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5, 3-18.
- Fine, G. A. (1990). Organizational time: Temporal demands and the experience of work in restaurant kitchens. *Social Forces*, 69, 95-114.
- Fürst, S., Schönhagen, P., & Bosshart, S. (2015). Mass communication is more than a one-way street: On the persistent function and relevance of journalism. *Javnost—The Public: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22, 328-344.
- Gray, A. (2003). *Research practice for cultural studies: Ethnographic methods and lived cultures*. London: Sage.
- Hansen, E. (2012). Aporias of digit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14, 678-694.
- Hanusch, F. (2015). Transformative times: Australian journalists' perceptions of changes in their work.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55, 38-53.
- Hawley, A. H. (1950).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Ronald.

- Hubers, C., Schwanen, T., & Dijst, M. (2008). ICT and temporal fragmentation of activiti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initial empirical findings.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9, 528-546.
- Jones, M., Munir, K., Orlikowski, W., & Runde, J. (2008.12). *About time too: Online news and changing temporal structures in the newspaper indust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Paris, France.
- Lauer, R. H. (1981). *Temporal man: The meaning and uses of social time*. New York: Praeger.
- Lee, H., & Liebenau, J. (2000). Time and the internet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ime & Society*, 9, 43-56.
- Licoppe, C. (2010). The “crisis of the summons”: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agmatics of “notifications,” from phone rings to instant messag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6, 288-302.
- Lievrouw, L., & Livingstone, S. (2002). Introduction: The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In L. Lievrouw & S. Livingstone (Eds.), *The handbook of new media* (pp. 1-15). London: Sage.
- Lim, J. (2012). The mythological status of the immediacy of the most important online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13, 71-89.
- McLuhan, M. (2001).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Miller, D., & Slater, D. (2000).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UK: Berg.
- 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O’Sullivan, J., & Heinonen, A. (2008). Old values, new media. *Journalism Practice*, 2, 357-371.
- Orlikowski, W. J., & Yates, J. (2002). It’s about time: Temporal structuring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13, 684-700.
- Picard, R. G. (2014). 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ism? Evidence from the changing news ecosystem. *Journalism Studies*, 15, 500-510.
- Postill, J. (2010). Introduction: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 In B. Bräuchler & J. Postill (Eds.),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 (Vol. 4,

- pp. 1-34). New York: Berghahn.
- Reckwitz, A. (2002).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 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5, 243-263.
- Rifkin, J. (1987). *Time wars: The primary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New York: Touchstone.
- Rosa, H. (2003). Social acceleration: Ethic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 desynchronized high-speed society. *Constellations*, 10, 3-33.
- Scheuerman, W. E. (2001).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empire of speed. *Polity*, 34, 41-67.
- Schlesinger, P. (1977). Newsmen and their time-machin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8, 336-350.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 New York: Basic.
- Schudson, M. (1986). When? Deadlines, datelines, and history. In R. K. Manoff & M. Schudson (Eds.), *Reading the news* (pp. 79-108). New York: Pantheon.
- Scott, B. (2005).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digital journalism. *Television & New Media*, 6, 89-126.
- Sheller, M. (2015). News now. *Journalism Studies*, 16, 12-26.
- Shove, E., Pantzar, M., & Watson, M. (2012). *The dynamics of social practice: Everyday life and how it changes*. London: Sage.
- Silverstone, R. (2005). Introduction. In R. Silverstone (Ed.), *Media, technology and everyday life in Europe: From information to communication* (pp. 1-18). Hants, UK: Ashgate.
- Singer, J. B. (2006). Partnerships and public service: Normative issues for journalists in converged newsroom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1, 30-53.
- Singer, J. B. (2010). Quality control. *Journalism Practice*, 4, 127-142.
- Spitulnik, D. (2002). Mobile machines and fluid audiences: Rethinking reception through Zambian radio culture. In F. D. Ginsburg, L. Abu-Lughod, & B. Larkin (Eds.), *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 (pp. 337-35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pitulnik, D. (2010). Thick context, deep epistemology: A mediation on

- wide-angle lenses on media,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B. Bräuchler & J. Postill (Eds.),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 (Vol. 4, pp. 105-126). New York: Berghahn.
- Tameling, K., & Broersma, M. (2013). De-converging the newsroom: Strategies for newsroom chang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journalism practi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5, 19-34.
- Thurman, N., & Myllylahti, M. (2009). Taking the paper out of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10, 691-708.
- Tomlinson, J. (2007). *The culture of speed: The coming of immediacy*. London: Sage.
- Tuchman, G.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110-131.
- Virilio, P. (1986/2006). *Speed and politics* (M. Polizzotti, Trans.). Los Angeles, CA: Semiotext.
- Virilio, P. (1995/1997). *Open sky* (J. Rose, Trans.). New York: Verso.
- Wajcman, J. (2008). Life in the fast lane?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and tim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9, 59-77.
- Wajcman, J. (2015).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tschge, T. (2014). Passive accomplice or active disruptor. *Journalism Practice*, 8, 342-356.

The Internet and the News: Changing Temporal Practices of Journalism and Their Implications

Sumei Wang^{*}

Abstract

Journalism seeks high-speed practices and is often described as an occupation that races against tim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smartphones have exacerbated this behavior, which affects news production. Numerous scholars have argued that the Internet has made immediacy the prime goal of journalism, which has damaged its virtue. Whether the Internet has deteriorated the quality of journalism has yet to be determined.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journalistic practices involving the Internet. Up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is study discussed “a fetishism of the present” in journalism. Furthermor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of experienced news and media worker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hanges in temporal orders in news production, as well as journalists’ work strategies and reflexive thoughts regarding news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Keywords: time, speed, journalism, news value, internet, practices

^{*}Sumei W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